

中亚东干小说中的女性生活图景

——以尔利·阿尔布都小说为例

常立霓

(上海政法学院新闻传播与中文系 上海 201701)

【内容摘要】东干作家尔利·阿尔布都创作了一系列生活在中亚的中华回族女性后裔群像,既有在回儒双重文化规约下命运多舛的老一代东干妇女,也有在苏联卫国战争时期兼具男女双重角色的东干女性,还有在集体农庄时期因掌握知识而改变了命运的东干新女性。这些被遗忘的女性群像的塑造,对于我们深入了解东干女性的现实生活、丰富世界华语文学女性形象以及中国回族女性在社会转型期自我主体建构的借鉴等方面都具有一定的意义。

【关键词】阿尔布都 东干女性 回儒文化

中图分类号 J10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9106(2010)04-0089-05

东干文学是近些年华语文学世界发现的一片新大陆。“东干”是清朝同治年间陕甘回民起义军失败后迁往中亚(集中在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的华人。“中亚东干族是中国穆斯林在境外的一个最大的侨民群体。……他们是陕西近代文明的活化石,也是在境外保持中国传统文化的典范,这在世界侨民史上实属罕见。”^{[1](P3)}他们说着地地道道的西北地区方言,他们拥有着一无二文学语言表达方式——借用俄文字母来拼写汉字,进行了大量的华文文学创作,向我们展示了东干人民130多年的发展历程。东干作家尔利·阿尔布都小说创作数量之众、质量之高,是其它东干小说家无法望其项背的。

阿尔布都终其一生都在为东干人民写作,他的这支笔从来也没有离开过东干乡庄,他写东干人的历史与现状,困惑与希望,苦痛与欢乐。阿尔布都小说中的男性群像与女性群像是那么的特色鲜明、丰富多样,借助这些人物群像的命运变迁、悲欢喜乐,作家传达着自己对于这片生于斯长于斯的“乡庄”的深厚情谊。

小说中男性与女性所代表的符号意义非常明显。“男性群像”承载着本民族的历史、社会主流价值观等宏大意义,而“女性群像”的符号意义恰恰

相反,她们作为社会的一股潜流,从婚姻制度、家庭成员、孩子教育、道德品质等方面表达着“男性群像”所不能触及的社会层面。分析小说中的“女性群像”,既可以了解东干女性的现实生活图景,也可以与其它华文文学中的女性形象进行比对,还可以对中国回族女性在社会转型期的主体意识建构起到某种借鉴作用。

一、回儒双重文化规约下的老一代东干女性

任何侨民的迁移史都是一部血泪史。无疑,东干民族也不例外,甚至更为惨烈。作为失败的起义军,前有雪山、后有追兵,长途跋涉,据说过境定居时几乎是百人存一,只有六七千人存活了下来。从迁居到被接纳,又需要百倍的努力与挣扎。阿尔布都的小说是东干人生活百科全书式的全面展示。如果说起义军领袖白彦虎(《独木桥》)、二战英雄哈尔克(《扁担上开花呢》)、老英雄苏来曼(《老英雄的一点记想》)、集体农庄的老马富(《老马富》)、巴给(《头一个农艺师》)等一系列男性人物抒写的是东干民族的英雄史诗的话,那么被卖到清国的米奈(《记想》)、绰号为“孙二娘”的开婕子(《扁担上开花呢》)、头一个女性知识分子——农艺师聪花儿(《头一个农艺师》)等东干女性多舛的命运体现出的则是东干人民的生活百态。

* 本文受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科研创新项目资助(09YS495)。

* 作者简介:常立霓(1974-),女,上海政法学院新闻传播与中文系副教授,博士,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华语文学研究。

第一代东干移民的文化观与价值观,还深受中国封建传统文化与伊斯兰文化的双重影响。伊斯兰教自唐传入中国,就与中国封建文化不断地磨合,甚至在明末清初时,以李贽、马注、王岱舆等为代表的学者掀起了一股“以儒诠经”的活动,即用中国传统文化来解释伊斯兰教理,在解释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将伊斯兰教教义与中国儒道观念紧密地联系起来,使天方之经与孔孟之道进行对话,对话的结果就是回族文化受到回儒双重文化的影响,进而“加强了中国回族女性的深闺制度,使得回族妇女被两种文化体系中传统女性观的交集所规约”^[2](P75)]。

显然,老一代东干女性的命运就是在这样的文化规约下变得异常艰难。阿尔布都的小说《记想》短短几千字,却勾勒出东干妇女百年的历史变迁。小说的叙述者是两位六十几岁的老人,历史从他们不经意的谈话中自然流淌。

阿尔布都的小说中屡次提到女性的穿着打扮,这并不仅仅描述人物形象的需要,对于伊斯兰女性来说,服饰不仅仅是蔽体,它还代表着伊斯兰的宗教观与文化观。女性着装要以不引起异性的邪念为原则,所以《古兰经》中道:“你对信士们说,叫她们降低视线,遮盖下身,莫露出首饰,除非自然露出的,叫她们用面纱遮住胸膛,莫露出首饰,除非对她们丈夫,或她们的父亲,或她们的丈夫的父亲,或她们的儿子……”^[3](P24-31)]所以伊斯兰妇女服饰的主体文化特征就是戴盖头,穿着宽大的衣服,不饰脂粉。正如《古兰经》所言:“应当安居于你们的家中,不要炫露你们的美丽,如从前蒙昧时代的妇女那样。”^[3](P33)]

基于这种根深蒂固的伊斯兰女性观,两位久别重逢的朋友在城里看到当今东干女性的穿着与行为,意见颇不一致。马蛋子看着甚为不满。“姑娘穿的短袖子衫子(裙子),龙头鞋,梳的喷头,胳膊上戴的金表”,小伙儿向姑娘献花,姑娘笑嘻嘻地接上后挽着小伙儿的胳膊走了,看得马蛋子瞠目结舌,他吃惊的表情“就连拣细荏儿一样,眼不眨地盯地看了”。

可想而知,新时代东干女性的服饰与行为的变化对东干老人马蛋子的冲击力有多大。叙述者“我”,也是一位与马蛋子年龄相仿的老人,但观念却完全不同。由此两人回忆过去或亲历或耳闻过的一些女性的故事,随着记忆的不断浮现,两位老人反省了东干的女性观,同时以粗线条展示出百

年来东干妇女的辛酸史。

首先“我”提到了传统的妇女观受到伊斯兰文化的深刻影响。以前,三哥子阿訇说“女人们的一根子头发但是叫旁人看见,失‘伊玛尼’(信仰)了,变成‘卡费儿’(不信教者)了,女人但是上街,顿亚(现世)临尽呢”。这种思想影响了许多老一代东干人,由此也产生了许多悲剧:吴三子老汉的媳妇因为穿毛蹄子(长统袜)挨了一顿鞭子不算,还被迫离了婚。

另外,买卖婚姻也葬送了许多东干女性的幸福。父亲要把13岁的姑娘卖给一位48岁的男人,为了逃避厄运,姑娘与年青伙计私奔,没想到私奔后在整个社会无容身之地,只得回来再次接受命运的安排——嫁给一位六十岁的老汉。提到马蛋子的老婆米奈,更有一段故事。米奈被卖到清国,但坚强的米奈勇于与命运抗争,在途中杀掉迎亲的清国老汉独自驾车回来,逃往异地念书去了。小说最后把造成老一代女性悲剧的原因归结到了老规程上“老回事上啥都好,可是有一样子不好——新女婿不娶新媳妇去,新女婿但是到了媳妇儿家,两个儿站到一达,给一切客把‘色俩目’说了,把礼使了,一达上了喜车子,到了婆家,给这儿的客再把‘色俩目’说了,把礼使了,你看多好!这么价但是干,姑娘也就不低贱了”。看样子,在男女婚姻中,只有男女平等,打破婚姻陋习,女性才能得到真正的幸福。

老一代女性虽然命运不济,但作家在表示同情的同时,也让她们承载着中国的传统美德。伊斯兰文化中尊老敬老思想和儒家文化的孝道交融结合而成的回族“孝”文化,在回族家庭结构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和影响。《古兰经》把孝敬父母提高到天命的高度来对待。先知穆罕默德曾说“所有的罪恶末日都要受到惩罚,对父母不孝敬的人受到惩罚最快”。在“孝”的问题上,新、老两代女性的态度也出现了偏差。老一代女性严格地恪守着孝道,不仅孝敬还顺服,无论长者是对是错,一味地忍让顺从,精心侍候。《我爷的脾气》中“我妈”就是因为我爷的脾气倔强而常受气、照顾我爷又积劳成疾,尽管如此,临死前还叮嘱儿女要孝敬爷爷,以免邻居笑话。但随着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发展,长辈在家族中的家长角色逐渐受到挑战。孙女不是一味地孝顺了,而要与爷爷论理。海麦要去莫斯科旅行,爷爷还抱持着陈旧的思想,认为女子抛头露面出远门是丢脸的事。但海麦据理力争,代表着新一

代回族女性的观念：“为我爷的故事儿，为他的几句不相干的话……打脸（丢人）、丧德的时候过哩，那是把女子圈门（关在家里）的时代上遇下的，那会儿，光不是丫头，有娃娃的媳妇子，把男人撵下，跟上单另的人（别人）跑掉的也有呢。我们的时代上的姑娘，不干那么低贱的事情，我们是学堂（学校）里调养下的，得哩苏维埃知识的姑娘，那么价的事情，我们的头里头（以前）都没有的。”最后以新时代受过教育的女性的成功而告终。《补丁老婆儿》中的“补丁老婆儿”，一辈子以为人缝补衣裳为业，虽然生计艰苦，却不贪图钱财、品德高尚，把遗忘在衣袋里的六个金币如数还给主人，是位可钦可佩的老人。

二、战争时期兼具男女双重角色的东干女性

二战对于卷入战争的人民来说是不幸的，但在苏联卫国战争的特殊时期，却给了东干女性一个解除束缚的机会。卫国战争以前，东干人的封建意识、宗教意识相当浓厚，妇女的社会参与程度低，活动限制严，足不出户，不能抛头露面，不与男客人同桌吃饭，她们只干家务活，带养孩子。但是战争使大多数东干男性奔赴战场，迫使大批东干妇女走出家门，走入社会，走向田间，担当起全部的农活，兼具男女双重角色。这对东干族妇女来说无疑是一次历史性的解放。

《扁担上开花儿》中绰号为“孙二娘”的开婕子就是这一历史时期的典型代表。在苏联成立集体农庄的时候，她积极配合农业集体化运动，主动把男人埋在窖里的4800公斤麦子献给政府当种子，因此与丈夫发生争执，在扭打过程中丈夫还因此受伤落下残疾，从此两人分道扬镳。随后她又领导乡政府妇女工作，为妇女们做了许多事情。“临后，那个女人在乡苏维埃上领首（领导）了很几年的妇女部分。……到了那塔儿（哪里），编袖抹胳膊的能说，能当的一面儿，青年们把她叫成孙二娘哩。”一个舍己为公、大胆泼辣、敢做敢为、干练利落、雷厉风行的东干女性跃然纸上。这样的女性在传统的东干乡庄中是不可以想象的。

中篇小说《头一个农艺师》依然以卫国战争为故事背景，讲述战时东干乡庄的女性们，这些女性的生活环境较为宽松。在欢送会上，女人与男人们一起无所顾忌地唱歌跳舞。“一时三刻，三弦子，胡琴子，鼓鼓子，瓦子都要脱了。外间子房里的女人们跟上男人连响琴也唱脱哩。”女人还可以当众起舞“阿舍儿看的吼叫的症候大得很了，对着马丹望

了下，出来，细条汉架，杰俊女人先在场子上走了几步，之后把两个嫩绵绵的胳膊伸开，就像设虑（预备）地飞呢，把身体拿地稳稳儿地，就连小脚女人走路的一样，把指头拈地叭叭地，连一股风一样，为囊（跳舞）脱了，她的后头巴给的媳妇子海彻儿也跟上了。”

当她们的丈夫、儿子奔赴战场的时候，东干女性在为亲人担忧、经济困顿的双重压力下，担当起了全部的重任。“在卫国战争时期表现最突出的是东干族妇女。战争使许多东干族妇女走出家门，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及生产劳动，他们取代参军入伍的青壮年，成为农庄的主要劳动力。他们提出的口号是‘替上前线的丈夫父兄们多干些活！’”^{[1]P193}这是一群多么让人可亲可敬的女性。连集体农庄的主席都不得不改变观念，夸赞道“那会儿的光阴上，把女人们苦了，说的除过抓锅、养娃娃，女人们啥上都不中用。可是这会儿，打粮食、给牲灵拉过冬草料等活儿，女人们干得一点儿不比男人差”。

东干女性这些角色的巨大转变进行得相当顺利，在这个非常时期，东干女性以自己的勇敢与勤奋证明了自己，受回儒双重文化规约的一些保守的传统女性观念不攻自破、自动废除。从老一代人到东干男性，都不得不承认女性一点儿也不比男性差。从此以后，随着教育程度提高、社会的不断进步，东干妇女的地位也不断地得到提升。

东干女性虽然在集体农庄时期积极地参与了社会活动与农业劳动，突破了以往严格的闺密制度，但东干女性的整体素质还亟待提高。阿尔布都小说中众多的女性，哪怕是知识女性，无一例外，都要操持家务，这在很大程度上牵制了女性的精力。其次，经济活动无论是农业还是商业，几乎都是清一色的男性，女性被远远地抛出社会生产及生活之外，经济上缺乏自立性，社会参与的程度低。再次，出嫁过早，女性受教育程度低，致使女性的认知水平也较低。这些因素都导致东干女性整体素质较低。轻喜剧风格的小说《奸溜皮》、《后悔去迟了》，反映的都是东干女性因生活空间的有限而导致心理空间的狭窄，在处理夫妻关系、教育孩子等方面都暴露出许多问题。

《奸溜皮》虽是小说，但更像一部充满喜剧色彩的话剧。它借用话剧的表演形式，情节的推进、矛盾的发展、人物性格的展示完全由夫妻间的对话完成，也唯有在生活一般的对话中，才能完全展现女主人公言语琐碎、心胸狭隘、敏感多疑甚至胡

搅蛮缠的典型家庭妇女的性格特点。靴匠满娃子买了音乐会的门票兴高采烈地邀请妻子一起去观看,妻子却因放心不下15岁的儿子单独在家而拒绝了,夫妻的争吵由此开始。就在这样你一言我一语的对话中,争吵的语言逐渐变成了男性与女性思维的对话、心理的较量、性格的差别、观念的分歧。不能去听音乐会,满娃子只可惜票钱白扔了,妻子法麦立即提起往事,“哪怕它十张帖子(东干依然沿用旧语,即“钱”)呢……年时(去年),替李娃子的媳妇子,你出了八张帖子的出租钱,也没死掉里!为我丢掉五张帖子怕啥呢?”丈夫害怕吵架强忍住不吭声,妻子见势得寸进尺,拿别的男人与丈夫作比,“你是个啥男人啥,一年四季,三个帖儿,五个帖儿,在嘴上吊着呢,人家西拉子也是男人,给婆姨(妻子)买的金耳坠子,金戒指,金绳绳子(项链),把毛婊子拿金子包掉了。”法麦由东扯到西,从去年的事又想到前年的事,继续斥责丈夫对自己妹妹不好,在公众场合不叫她的昵称等等,把陈年旧事一古脑儿地搬出来,满娃子不厌其烦,又不能争辩,因为他的每次争辩只能为妻子提供更多的继续争吵与谩骂的理由,那么,这场战争将无休无止地继续下去。音乐会已经开始了,满娃子沮丧地让儿子把票退了,儿子为父母因自己而不去听音乐会感到困惑,法麦摸着儿子的头拉着哭腔道“我的葫芦呀,你才十四,交上十五,到一百岁上也罢,我是你的妈妈,你是我的娃娃,我睡梦里都操心你呢。你病下了,害谁呢,我的娃?还不是害我吗?你大(父亲)做啥呢啥,谁说啥话呢,裤子上拍一把土不沾,还管你呢吗!”最后,苦恼的满娃子“把票扯成糊糊子,擗到地下,踏给了一顿脚。”出去喝酒至深夜才醉醺醺地归家。小说《后悔去,迟了》表现的是家庭妇女白姐儿失败的教育方式,她对儿子的爱理解很浮浅,只集中表现在一个方面——吃。最后儿子得了肥胖症,只得就医。这就是“日常生活中无事的悲剧”,悲剧的根源还在于东干女性囿于家庭生活,受教育程度低,视野狭隘、见识浅薄。

三、知识改变命运——东干新女性

要想提高东干女性的整体素质,教育是个瓶颈。伊斯兰教义中崇尚知识,提倡男女均有受教育的平等权利。穆罕默德说“求学对于每个男女穆斯林,都是宗教礼仪”。但东干又深受中国“男尊女卑”、“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文化的影响,加之经济条件等外在因素的制约,女性受教育程度相

当低。所以女性要受教育,教育观首先得改变。

显然,作为东干民族生活的忠实摹写者,阿尔布都考虑到了这个问题,甚至不吝惜笔墨,用中篇小说《头一个农艺师》来叙述东干第一位受到良好教育服务于乡庄的知识女性——聪花儿的成长。小说中有意设置了聪花儿的一位好友——米奈,与聪花年龄相仿,却走上了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在回族文化与儒教传统文化的合力下,“女孩子不能多读书”成为东干人的普遍观念。聪花儿的奶奶虽然人品为人都在乡庄为人称道,但观念陈旧,不主张孙女继续读书:“老婆子都笑话着呢,说的丫头家念下书做啥呢,脸皮子都念厚掉了。”乡老用教规规劝米奈的父亲不要继续供女儿上学,“儿娃子(男孩)十二上,丫头子九岁上就担法日则(履行穆斯林宗教义务)呢,女娃子一担法日则,把念书的就要禁掉呢”。如若继续读书,那就是失“伊麻尼”(信仰),是反教的行为。在强大的传统文化、宗教文化的束缚下,一个不谙世事的弱小女孩子根本没有反抗的能力,服从了长辈的安排,米奈辍学回家养鸡做饭,继续着传统东干女性的老路。与米奈相比,聪花儿是幸运的,他的父亲是个开明通达的人,正是在父亲的一再坚持下,聪花儿才有机会学知识。父亲巴给在奔赴战场之前是乡庄的主席,在工作实践中他终于悟到了“知识就是力量”,“书就连空中里的武器一样,在头顶里旋了一辈子,没得上,穷难光阴里给我的少年使了坷绊(栽跟头)了。”“这会儿不是那会儿的光阴了,回族人也要念书呢,单另再没有路。”读书是东干人改变命运的唯一出路。聪花儿作为东干新女性的代表,教育给她带来了幸福,无论职业、爱情,还是人际交往、家庭生活都很美满。她考上农业技术学校,校长说“我们的技校里头,没念过老回回的姑娘连儿娃子,你是头一个。”她自由恋爱,破除乡庄不允许恋爱男女一起见面的风俗,与男友在乡庄的巷子里边走边说边笑。她把所学的知识运用到实际中,研制出稻子早熟半个月的方法,引起轰动,作为奖励,区委又送聪花儿到莫斯科去读大学,这一切,都是知识带来的。

当然,知识带给女性的不全是完满的结局。阿尔布都小说中还有另一类知识女性,却因个体的经济独立与自我意识的觉醒,摆脱了婚姻中附属地位,为坚持自己的价值观与丈夫发生冲突而导致婚姻破裂。《不素心》中的拉彦,读的是会计专业,会算帐,婚后不愿回到乡庄,要在城里坐办公

室,丈夫执意回乡,两人以分手告终。还有小说《哈婕儿》,女主人公哈婕儿同样因为与丈夫的价值观冲突,宁肯牺牲婚姻,也要坚持自己的观点,“从城里回来,对丈夫斩钉截铁地说:虽然咱们中间没有另干也罢,我不是你的人,我打你们家里走掉了,到你上,这会儿我成下旁人了,到我上,你也成下旁人了。”随着时代的发展,东干女性的性格大胆泼辣,凸显自我,对待婚姻的态度更加主动,能逐渐掌握主动权。《结婚》也是一部戏剧性很强的轻喜剧。第二天就要结婚了,未婚夫却听信谣言误以为未婚妻是个残疾人,违背婚前不能见面的乡俗执意要见面,使女方父母陷入尴尬的境地。可独立

漂亮的未婚妻大大方方见面后,却说自己看不上男方要退婚,使故事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转折,让未婚夫后悔不迭。这个戏剧性的场面别有意味,既是现代东干女性对自己命运掌控的写照,也是现代东干女性婚姻关系乃至社会关系中摆脱被动地位的象征。

参考文献:

[1]王国杰.东干民族形成发展史[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

[2]骆桂花.甘青宁回族女性传统社会文化变迁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

[3]马坚译.《古兰经》[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上接第88页)规范精神

正义的社会理应是一个平等社会,人人拥有平等机会,人人都在平等理念指导下参与社会活动。由于我国“人治”思想影响深远,建设“法治”社会的步履缓慢,这也给各种不平等思想和制度以可乘之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水平逐步提高,物质生活极大丰富,但社会总成果在人与人之间的分配差距却日益扩大,社会不平等现象日益突出。国家历来是保障社会平等的主要手段,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国家已经不能承担保障社会平等的全部内容,社会平等保障手段走向多元化,而构建公民参与网络,增加公民的社会资本,增强公民间的交往与合作,通过互利与互惠的交换活动,培育公民平等理念,在公民间构建信任、互助的规范。

2.在公民参与网络中培育参与精神

在一个民主社会中,公民参与网络的密集程度决定着公民为共同利益合作的程度。网络越密,公民越有可能为共同利益进行合作,越可能解决集体行动的困境。加强公民参与网络的一个重要渠道就是培育居民的参与精神,加强居民的互动交流。柯林斯的互动仪式理论告诉我们,互动是人们利用文化资本和情感能量进行交换而形成的,它能为参与者或关系群体带来情感能量。普特南的研究表明,广泛的公民参与网络为成功的合作和社会资本积累创造了机会,对于民主制度的绩效来说,至关重要的是普通公民在公民社会中充满活力的群众性基层活动。

3.在公民参与网络中培育自治精神

扩大公民的公共空间,增大公民互动的频率,培育公民的自治精神。鼓励公民在参与社会活动中培育自助、互助和助人精神,倡导民众主动参与社区发展、自主解决社会问题

的精神。扩展公共生活领域,构建公民参与网络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是培育社会中间组织。中间组织是介于政府和市场之间的社会组织,它不具有政府组织的行政指令性,也不具有市场组织的完全盈利性,它是非盈利的社会服务组织。其最重要的意义在于营造社会成员共同维护的社会资本,是公民社会的组织化形式,反映了社会的自主性和公民的自治性。二是发展社区组织。社区是组成现代社会的基本单元,在塑造公共精神,发挥公民自治性方面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如建立“居民听证会”、“民主议事会”让居民参与自身社区的管理;另外,还可以通过鼓励居民参加各种横向互动与交流,来构建社会支持网络。只有增强居民参与各种社区活动的积极性,才能增加他们的了解与沟通的机会,也才能在他们中建立信任与互助的关系,培育自治精神,也最终能够为了共同利益而合作,解决集体行动的困境。

参考文献:

[1][美]明恩溥.中国人的素质[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8:95.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44.

[3]黎珍.正义与和谐——政治哲学视野中的社会资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203-206.

[4][英]戴维·赫尔德.民主的模式[M].燕继荣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380.

[5]笪素林.社会治理与公共精神[J].行政学研究.2006(9):94-95.

[6]张华,赵海林.公共精神:公共管理的核心诉求[J].天府新论.2008(6):102.